

报告文学选

BAOGAO
WENXUE
XUAN

1988
1988

1988 年 报 告 文 学 选

周 明 刘 茵 龚 玉 编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一 年 · 北 京

责任编辑：龚 玉 胡玉萍
封面设计：徐中益

一九八八年报告文学选

1988 Nian Baogaowenxue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2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frac{9}{16}$ 插页 2

1991年5月北京第1版

199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ISBN 7-02-001176-4/I·1095 定价 5.80 元

I 25

编 选 说 明

1988年，是报告文学大丰收的一年。由全国 108 家刊物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编选基础。

本书坚持原编选方针：入选作品要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题材、风格、手法要求多样化；作者要有广泛的代表性。某些虽有争议，但内容健康，风格手法有新的探索、并有一定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也将酌情选入。所选作品，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发表时间相同的，按篇名第一字笔划为序。

《1988年报告文学选》共收入作品 9 篇。由于篇幅所限，一些长篇报告文学，如李延国的《走出神农架》（《解放军文艺》1988 年 1 期）、尹卫星的《中国体育界》（《花城》1987 年 6 期，1988 年 1、2 期）、谢德辉的《钱，疯狂的困兽》（《芙蓉》1988 年 2 期）、赵瑜的《强国梦》（《当代》1988 年 2 期），都未选入。

由于水平有限，选本很可能有遗漏和不当之处，欢迎各方面有关人士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1990 年 7 月

目 录

世界大串连

- 中国出国潮纪实胡 平 张胜友 (1)
- 大血脉之忧思梅 洁 (63)
- 权柄魔术师戴 煌 宋 禾 (108)
- 国殇霍 达 (149)
- 李氏兄弟闻 海 (225)
- 红色的十字架

- 医务界现状一瞥谢致红 赵京平 (259)

中国大团圆前奏曲

- 海峡探亲潮纪实(香港)巴 桐 (319)
- 安危所系李广智 龚建社 (355)
- 蔚蓝色的呼吸
- 海南：“人才流”的激涨、退落及其它陈冠柏 (407)

世界大串连

——中国出国潮纪实

胡 平 张胜友

开 篇 之 前

对于今天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的人们来说，大抵都不会忘记二十一年前那场震撼了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的红卫兵大串连。

红旗，标着形形色色长征队名的红旗，红日磅礴时云锦般攢拥。步履，带着棒头般的信念与累累血泡的步履，犹如太平洋风涛般壮观与骤密。红卫兵大串连的洪流，似乎是杂乱无序，遍倾全国——从老一辈革命者曾饮马的源头到历代文人骚客留下诗章的名胜古迹；从被红海洋卷得晕糊糊的繁华都市到边境荒僻的小寨……

当今的中国，又掀起一股“大串连”的洪波——这股洪波涌出国门，冲出亚洲，泻向世界。因为它的国际性，我们姑且称之为“世界大串连”。

“留学”这个词，也许对我国广大城乡的工人、农民、干部来说，还显得陌生。这样一句话：“Flight No. 53 to Paris will depart from Gate 6 at 9:30 p. m. Will all the passengers holding tickets kindly proceed to Gate 6 at this time.”

Thank you.”（“开往巴黎的 53 号班机于晚上九点半由六号门起飞。请所有持票旅客现在前往六号门。多谢合作。”）对于他们更是显得天书般莫测高深……

然而，“留学”确如一个游荡的幽灵，早已在我国人才荟萃的大都会里闹得沸沸扬扬。上面这句话，早已几十遍地响起在我国一年举办四次的众多“TOEFL”（“托福”）考试考场上。每次它由二男一女重复三遍，几十万名中国人从耳机里听过这极纯正、极富感染力的美国口音。他们知道这是考试开始前一个让自己检查听音设备的步骤，如果不清楚，自己该马上举起手报告。更多的正待报考“托福”的中国人也熟悉它，犹如熟悉北京有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有人民英雄纪念碑。

仅以北京为例，1981年首次“托福”考试，考生是二百八十五人，1983年是二千五百人，1985年是八千人，1986年达到一万八千人。据1987年的前三次考试统计，人数更猛增到二万六千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自费留学生。据说，现在世界上每年有数十万人参加“托福”考试，其中一半是中国人（包括台湾和港澳地区在内）。

有关数字显示，自1978年以来，我国留学生数量与年俱增。九年来，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超过五万人。

当今的“大串连”与昔日的大串连同样恢宏。后者是体现在量上，前者则体现在质上——已经走的和将要走的出国留学人员绝大多数是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

红卫兵大串连并不杂乱无序。也许当年飞越中国上空的美国大鹏侦察卫星目睹了网络般的轨迹呈现出的某种有规律的变化。某些点好似强大的磁场，向着它们，多少旗帜立马转向，多少步履日夜兼程，多少征尘扑上双肩，似乎一场宏伟的战役前，

千军万马在紧急集结！它们便是韶山、井冈、瑞金、遵义、延安、北京……

当今的“世界大串连”也同样目标明确。它的流向大抵是欧洲、北美——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美国……以赴美者人数最多。今天已有三万余名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在美国一千多所大学学习。

当今的“大串连”远比昔日的大串连长久。一走二年、三年，或者五年、八年，也许还有人就此做了黑头发、黑眼珠的洋人……

当今的“大串连”也远比昔日的大串连深刻。后者浮滥的激情不过是涨得快也退得快的潮水，留驻在人们心田的只是一块荒凉的大漠，成了今天孩子们不可思议的新“天方夜谭”；而前者，则有如执着地盘上大树的青藤，越来越强劲地涌入高楼的长风，它给予我们民族各方面的影响将是难以估量的……

这是一个耐人琢磨的历史现象。当今“世界大串连”的许多参加者们正是二十一年前红卫兵大串连的亲身经历者。当年没有比他们对“帝、修、反”更义愤填膺的了，今日没有比他们对奔去那片新大陆更煞费苦心的了。仅以我们读大学时的班级——复旦大学中文系 1977 级文学专业为例，毕业后分配在上海的二十多位同学中，已有十位去了美国，其中绝大多数是“老三届”……

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对眼下的这一次“世界大串连”，正议论蜂起，反响强烈——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会，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当今中国国门洞开、八面来风，出国留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之一，应该予以肯定。北京大学的一位

青年教师说，出国留学热是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正常现象，就像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一样顺理成章，留学热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要实现四化，必须坚持打开这扇大门。

另一些人则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下，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国内的建设，大家都打着留学的旗号去放“洋”，国内由谁来建设？而且，许多人只是把出国留学当作镀金捞好处的一块跳板。

相当一些人脑袋里的那根弦还绷得挺紧，出国留学在他们眼里无异于崇洋媚外。四川一位知识分子与执意要出国留学的儿子尖锐对立到几欲脱离父子关系的程度。少数当年因曾留学海外而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务”、“间谍”的人，仍然未走出心中那片沉沉的阴影，他们担心一旦形势又黑下脸来，自己意欲出国留学的子女又将沦为“特务”、“间谍”……一位在公安战线工作的老干部，连着几个月几乎一日三餐都和跃跃欲试的儿子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他曾在部队当过团政委，现在却感到口不从心，为此他辛劳而又精心地制作了一本剪报。一日，他一本正经地将它掷到儿子手里，仿佛掷下一颗原子弹。儿子一打开：凶杀、失业、强奸、吸毒、走私、赌博、抢劫、性聚会、同性恋……儿子却轻松地咧嘴笑了，“爸爸，我看你蛮够格编本书了，书名就叫《西方犯罪大全》……”

文学不是评判，不应该等同于某一种结论。在我们眼里，文学历来只是人与人之间寻求理解与抚慰的一种特殊手段。因此，本文着重记述的是已经参加或者将要参加这一“世界大串连”的人们的生活轨迹和心灵历程……

—

上海。晨曦微露，大街小巷还处于一夜好梦的袅袅余音里。位于乌鲁木齐中路、淮海路交界处的一幢西式花园楼房前却人头攒动，不一会儿排起一条长龙，争先恐后、熙熙攘攘的情状绝不亚于清晨小菜场里抢购海鲜或是时鲜菜蔬的热闹景致。所不同的是，人们在这里“抢购”的是一种特殊的、也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商品”——赴美留学签证。

大院旗杆上的星条旗和院门上方的一块镶金的鹰之雕像，标志着这里是美利坚合众国驻沪领事馆。

上午八点，一位长着中国人面孔的男职员，出现在大门边。那神气却是美国式的，一番半是训斥、半是交代之后，他开始发牌儿了。这是“中为洋用”，为了对付争先恐后的签证申请者，美国人学来了我国大小商店里销售热门商品时常使用的一着——按先来后到发牌儿为序，无牌儿者，一律免排，明早再候。

先凭牌儿进了领事馆与美国官员面谈了的人，出来时不外乎两种面孔：一是眉头嘴角溢满了笑意，好似阳光下正溶化的奶油蛋糕，这意味着面试及申请被通过了；一是耷头垂脑，满脸冰霜，仿佛刚刚被扒走了装有本月工资的钱包，这显然是因为哪一项手续不合格被刷了下来。外面的人们迅即围拢上去，五人一伙，十人一堆：

“你为什么没批？”

“你有啥条件够批？”

“领事先生找你怎么谈的？先问的啥？”

“洋鬼子用中文问，还是用英文问？”……

宛如一个个小型的现场交流会。而且这交流会，一年三百

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召开，风雨无阻。

它们还是“横向联合”，跨省市的。迤逦长龙里，除多数是上海人外，还有不少带南京、杭州、南昌、合肥口音的人。由于美国只在上海、广州等几个大城市设有领事馆，其它城市欲赴美国留学者，则必须仆仆风尘赶到距离最近的领事馆递交签证申请材料。队伍里，还有来自几千里外的北京、广州的申请者，他们的申请在当地已被领事馆驳回，“不到长城非好汉”，希冀“东方不亮西方亮”，便又抖擞精神来上海滩上再试运气……

北京。秀水东街，美国驻华使馆领事处。

1987年8月11日上午十点多钟，我们到了这里。房外搭了一个棚，棚里正由保安人员检查申请签证者随身携带的各式提包，杜绝任何武器、凶器带进房内。接着，又得通过身上稍有任何一点金属件便会让蜂鸣器骤然响个不止的安全门。其检查之严密，不亚于首都机场。据说，这在两个月前是没有的。

棚外，还有上百人在烈日下等候。我们见一位年约三十七、八的男子手里拿着三份用中、英文印制的已填好的表格，分别为“留学生调查表”、“非移民签证表”、“家庭情况调查表”。“非移民签证表”上有六项内容，其中有：是否判刑？是否受审？是否参加共产党组织？是否参加纳粹组织？我们愤愤然了，怎么好将那光辉的“少”与那野蛮的“卐”并列？！他许是看出了我们的心思，淡然一笑道：“美国佬瞎掰，我们也瞎掰嘛，我是党员，我填的则是‘否’。”在“家庭调查表”上，我们看到他有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已有十五岁，正在北京念初三，小的是女儿，十一岁，却在黑龙江上小学。我们问道：“你一家人两地分居？”“我和老婆离婚了。她是北大荒当地人，1979年为了回北京我们办了假离婚。回城后我到处做龟孙子，腿都快跑折了，办了四年都没能把她给办

来北京。1984年我们真离了……”他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嘴里吐出的浓浓烟雾与他眼里的郁郁神色，在我们面前久久未散……

一个大热天也西装革履，二十七、八岁的男青年从领事处出来，看那副迷醉劲，申请签证准通过了！人们一下拥过来。在他，此刻也有饶舌的需要，好象不如此，那像青岛啤酒泡沫一样咕噜咕噜成串冒着的喜悦压进肚里，非把他憋死了不可。他顾不得卸去“铠甲”，依然是位“奈温将军”，扯开嗓子道：

“一进门，一个中国人收去了申请材料，你就跟他走。先是问询处，有啥不清楚的你可再问问，有机玻璃的窗口，小得伸不进拳头。以前发生过哭闹事件，有死乞白赖一定要去美国的，丢尽了咱中国人的脸。窗口能伸进拳头那就麻烦了，别看美国人一个个人高马大，一样怕死，现在还在窗外加了铁栅栏，只让你低着头往里瞅瞅……再过去，又是一排三个窗口，我急着和领事谈话，没细看，好像有几个人在那里办公务出国签证。今天是三个领事谈话，一人谈一个，短的十几分钟，长的超不过二十分钟。行，当场告诉你，不行，就要你bye-bye走人，这就是美国人的节奏！要是放在咱中国的衙门里，甭说放人漂洋过海这么个大事，就是一件芝麻小事，他抽根烟，喝口茶，再打一通官腔，就得二十分钟……三个领事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若把那高鼻子、蓝眼珠给换了，走在大街上，我保证没人拿他们当外国人。来之前，我打听了，他们三个都在北大留过学，可惜我不是北大毕业的，要不谈话气氛就会更亲热些。你们各位中有北大毕业的或是父母在北大当教师的，可要自报山门，有了校友的情分，没准他们能照顾照顾。我的经验是少说话，领事怎么问，你就怎么答，不要东扯葫芦西扯瓢，更不要作过多的解释，解释多了，领事反而生疑……”

等他终于感到必须卸去“铠甲”了，我们走过去问他：“你今天几点钟来的？”

“早上三点四十分到的，排第二号。第一号比我早五分钟到，可惜他未获批准，像是在美国的经济担保人不硬。一谈完，他就颓丧地走了，本来我还想为他出出点子的，都是中国人，出去挺不容易，得相互帮衬着点不是？”

魔鬼追逐过他。

几乎他一呱呱落地，父亲——一位已有三个孩子并在香港过着优裕生活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名不但为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献上了一百多套精选出来的唱片资料、同时也献上了自己的声誉和卓越事业的著名音乐家，就被卷入了一个长达二十六年，牵扯数百人的特大冤案！几乎从他懂事起，他就从父亲咚咚的脚步声里踩出的焦灼、母亲温暖的微笑后藏匿的困惑中，感觉到了自己未来的天地有如家里的过道一般狭小，他只有在从钢琴到留声机的仅仅三米的空间里，驰骋起自己一颗海草般拂荡的童心。他分辨音色的本领让父母吃惊，只须指出一次“这是定音鼓”、“这是英国管”，他准会在第二次碰见它们时绽出小天使般的笑容……

这小小的空间也岌岌可危了。“文革”伊始，他不得不出入于信托商店：抵当、贱卖，家里一只只沉甸甸的箱子空下来，能卖的都卖了，最后只剩下一架莫瑞森牌钢琴和一个收音机。那年月，收音机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好似夏日蝉鸣，害怕听它又不得不提着颤栗的心听它的父亲，只好决定卖那台陪伴了自己近二十年的世界名牌钢琴了。钢琴被抬走时，他觉得自己尚有几分绿意的童年也被劫走了，从此人生的大漠将如眼前的

房间一样空空荡荡，充斥虎啸，流窜磷火，自己却无所依傍，无处遁身……钢琴送去旧货商店，标价五百元，放了三个月，就是无人问津，又抬了回来。他紧紧地抱着它，热泪涔涔，宛如抱着自己失而复得的生命。

就是一根钢筋，也有断裂的时候。三年，五年，十年……他父亲忍着、等着、盼着，音乐家做起了统计员，两者唯一的共同处是都得用一串阿拉伯数字。他极力端正着态度，1959年去农村劳动，被人用锄头打瞎了一只眼，滴血的稿纸上竟然还冒出一只小曲，摇摇摆摆飞起来，去歌颂纸糊起来的“大跃进”……终于在一个晚上断裂了。事前不见一点兆迹，没有生之留恋，也就没有死前之徘徊，二百七十三粒鲁米那几乎是一口气吞下去的，这是足以使几个人毙命的剂量。好在他姐姐及时发现了，又及时地送去了医院。他拉着母亲冰一般的手，跟在担架后面。一路上神色复杂的眼睛围追不舍：有同情，有悲悯，但更有轻蔑、快意、满足与不甚满足……他没有回头，一步步镇定地走着，似乎前方就是尽头——人的世界的尽头，到了那里，他将永远不再回来，哪怕是要化作几缕轻烟、一阵松风，他也要永远地活在一个音乐的世界里……

他登上江轮，再是火车，又是汽车。在罐头盒般的车体里压缩了十二个小时，他像是吐一口痰被吐在了一个名叫胡集的小站。一个沙着嗓子，黧黑、枯瘦的小妇人走上前来，领着他走过一片又一片了无生气、薯叶摇瑟的荒土岗。他难以置信这竟是先他而来的姐姐。进村后姐姐“嚓”地划着一根火柴，一朵颤抖的小火苗默默地告诉了他一切：裂着缝的泥墙，片片剥落的棚顶，遮着塑料布的窗户，得屈成个虾腰才进得来的矮门……不知怎的，那小火苗突然在他眼里变成了一个星星火炬。对了，那是

在上海市少年宫，他和姐姐学跳芭蕾：纱裙。大蝴蝶结。清亮的眸子，宛如一枝带雨的梨花。腾挪的双腿，好似檐下剪春的紫燕。轻盈摆动的两臂，恰如潮风徐来时荷花那舒展的杏黄色花蕊……他几乎失声叫道：姐姐，姐姐，这才是我亲爱的姐姐啊！姐姐端上了一盘馍，这是房东大爷大妈特为他的到来而做的，掺着麸子和秕糠，粗糙得像是沙子捏成的，他咽不下。他注意到姐姐拿馍的右臂上露出一道道伤疤。此时，他还不明白童年与自己耳鬓厮磨的姐姐，现在怎么能几乎毫无怨尤地接受这块土地的贫瘠与荒蛮，就像眼前她正默默地咽下那发黑的粗馍……

后来他回到上海，在工厂找到了工作。尽管天不亮他就要离家，因为去厂里有十里路的奔波；尽管上班八个小时他得像根木桩似地站在打浆池边，灰尘涌进鼻子，涌进耳朵，涌进每一个毛孔，下班时一个人就像是刚从灰堆里爬出来似的；可只要回到家，一洗完澡，他就要走去西墙下的钢琴边，发疯似地练着琴，五指犹如水浪般永不疲倦地波动着。眼神，形形色色的眼神：阴郁，痴醉，嫉愤，迷茫，憧憬……在琴键上雨点般抛撒着，弧光般跳跃着，舟筏般起伏着。这里有令人窘悚的发泄，也有一往情深的寄托，还有精卫填海似的追求。几年之内，他攻下了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古典大师众多的作品。从1968年到1978年，他报考文艺团体二十多次，总政、长影、南京部队、广州部队……几乎每一次，考官们都像是从千年墓穴里挖出了一颗还能绽蕾吐香的古莲子般兴奋；然而每一次，他那刚刚萌生几许毛茸茸绿意的希望，又被一阵暴雨给劈头盖脑地摧残了！

魔鬼追逐过他。魔鬼也塑造了他。他不再那么容易冲动了，他终于明白了生活将一个扎大蝴蝶结、跳芭蕾的少女变成一个黧黑、枯瘦的少妇的严酷力量。他取了这严酷，用一块牛皮将自

已血口拉碴的心给结结实实包裹了起来。以致于1978年，现在他所在的音乐学院来上海招生，在四百多名考生里最后录取了五名之时，他竟然不去看榜。

“有你呀，孩子……”他母亲泪眼滢滢，喃喃道。

上帝青睐了他。

由于他学音乐的条件得天独厚，四岁便学钢琴，接触的音乐文献比任何同学都要多，一进校他就是高才生。奏鸣套曲繁复的结构，对别人好似北京迷宫般的大小胡同，对他则似在金秋十月的长安街上潇洒、恬适地散步。他手里像攥了一大把五颜六色的丝线，历史与生活在他的心灵上曾有过怎样的沉思和躁动，他就能据此织出怎样的音符和色调……他是学院里名冠京华的四大才子之一，其他三位渐渐又调了一拨，而他的才华与成就则始终被牢牢铆住。

他的取材于琴曲《广陵散》的大提琴曲《中国之诗》，别致新颖，“像是于嵇康式的洒脱之中揉进了黄河流域百姓那含而不露的机智”。这支曲子获著名俄罗斯作曲家亚历山大·齐尔品之遗孀主办的东方弦乐比赛大提琴作品一等奖。

1982年，香港交响乐团和唱片公司向国内征集作品，讲定由日本著名小提琴家西崎重子演奏。他拿出了《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在灵魂的大痛苦、大不安之后，他已经能相当平静甚至面带微笑地俯视1956至1976年中国的大地。因此这协奏曲里溢透一种俯视苦难、超拔苦难的高贵气息，令人颤栗，又令人沉迷，令人凄婉，又令人向往……接受过世界上多少著名作曲家作品的西崎重子，这回接过他的作品时，诚实地、不无遗憾地说道：“要演奏它太难了……”

1984年，他代表中国作曲家参加在悉尼举行的亚太地区音

乐节，他的《西江月——为小型乐队及打击乐而作》由新西兰国家交响乐队首演。总谱的扉页上，他写了这样一句提示：“人的内心与宏观世界的交流及生活中的诗意。”曲终，日本著名作曲家服部公一第一个跑到他的身边，称赞道：“你的音乐很充实，有坚实感，发自内心。我很惊讶，我第一次听到中国有这种作品。”来自台湾的众多作曲家们，一改对大陆代表团的冷漠态度，首席代表许常惠先生走过来热情地说：“想不到你们派了这么年轻的作曲家来开会，由此看出你们那边情况很好。”另一位代表告诉他：“听了你的作品，我对大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用这弘扬于世界乐坛的音符在人们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985年12月11日，他的作品音乐会在北京举行。他推出了一部最新作品《地平线》，这是一部包含管弦乐队与人声的单乐章交响作品，由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演奏，黎信昌、胡晓平担任人声演唱。这是他创作风格的一次重大突破，即使是不懂交响乐的人，也能感到它那扑面而来的宏大、洒脱的气势，豁达、明朗的情愫。一向苛求于他专业与做人的父亲，这次来信评介道：“《地平线》是你开始真正成熟的标志。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压抑的心情，小我的牵挂，在这部作品中完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宏观的构思，豪迈的气势与哲理性的思考……”

上帝青睐了他。不，上帝就在他心里。

他相当自信，且又坦率，坦率到咄咄逼人。他告诉我们：“音乐不象文学、绘画，现在文学界、美术界新人还是挺多的，在作曲这个领域，我敢说再过二十年，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出类拔萃的人才来超过我们几个。我们学院是中国音乐界的最高学府了，可从一年级至五年级我接触下来，要出特别出类拔萃的人才很难。我深信，我就是出去十年、二十年，回来之后，我的光芒还是不会